

厚今薄古

512
223

科学出版社

279

厚今薄古

科 学 出 版 社

1958

厚 今 薄 古

編輯者 科学出版社編輯部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总經售 新 华 書 店

1958 年 7 月第 一 版 書号：1254 字数：77,000

195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京) 0001—5,000 印张：3 3/8

定价：(6) 0.24 元

編輯說明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展开了厚今薄古問題的大辯論。

中国的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有一个十分光荣的任务。我們面对着的是这么伟大光輝的六亿人民排山倒海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我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速度，作促进派，使意識形态反过来能够很好地为基础服务，首先應該明确方向。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这一方向之爭，实質上是兴无灭資或兴資灭无两条道路的斗爭。为了便于广大讀者更好的学习、討論，从而使我們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爭得更有力，这里特把最近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部分重要文章和报导編印出来，供大家参考。

科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6月24日

目 录

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	(1)
——陳伯达談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郭沫若 (2)
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	范文瀾 (8)
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	范文瀾 (15)
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需走的道路·····	陳 垣 (20)
古史領域中“厚今薄古”方針的斗争意义·····	侯外廬 (22)
坚决貫徹“厚今薄古”的方針·····	呂振羽 (26)
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	刘大年 (28)
考古工作也要厚今薄古·····	夏 鼎 (36)
厚今薄古与青年·····	敢 峯 (39)

哲学社会科学界厚今薄古大跃进情况报导

哲学研究要面对现实·····	(45)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哲学座谈会摘要	
掀起经济科学研究和创作的新高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 经济组召开的首都经济学界大跃进座谈会纪要·····	(47)
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而战斗——4月5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 员会史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76)
語言科学研究为全民服务——3月29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 召开的語言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的座谈会摘要·····	(91)
文学研究所揭发批判“厚古薄今”·····	(93)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針指出了我們学术思想革命的战斗方 向——上海社联召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座谈会纪要·····	(95)
历史教学中不允许厚古薄今——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召开座谈 会·····	(103)
厚今就要重視研究毛泽东著作——上海史学界座谈厚今薄古問 題·····	(104)

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

陈伯达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今日应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他谈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

陈伯达首先对解放后八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了估价。他说，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还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一批新生力量已经成长；发表了不少好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经过思想改造、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有相当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了自己的人生观宇宙观问题，转向或靠近工人阶级。接着他指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指夏、商、周）、脱离革命实践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他认为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现实。而且考古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温故而知新”。他在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说，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哲学家的哲学文章并没有表现这一点。陈伯达又引用了马克思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的理论，来说明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主要的应该从现代开始到古代，应该克

服目前那种偏重研究古代的傾向。

在談到边干边学的时候,陈伯达批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瞧不起工人阶级、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說,渺視劳动人民的人,劳动人民就有权利渺視他。

陈伯达說,学校教育当然能够培养出很多人才,我們必須注意学校教育,但是过去进过大学、出过洋、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真正有学問的,相反的,有些有大学問的人却并没有进过大学、出过洋、得过博士学位。現在在各种崗位上已經出現了一批由劳动者出身、原来沒有受过正規教育、但在工作中經過努力学习已經能够开始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老干部;还有些单位存在一些科学技术問題,是科学技术人員多时沒有解决的,但一經羣众討論,就很快地得到了解决。这些新气象說明了劳动人民和老干部边干边学的新跃进。

陈伯达最后說,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應該跃进,而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所謂厚今薄古,就是說,不要薄今厚古;所謂边干边学,就是說,不一定要学好了才干。这正是毛主席說的“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干就是学习”。

(原載 1958 年 3 月 11 日“人民日報”)

*

*

*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郭沫若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5月15日写信給郭沫若同志,請他談談关于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方針問題。下面是郭沫若同志答复他們的一封信。

关于历史研究或教学的方針問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四个字，言簡意賅，只要我們能把它实行起来就好了。

“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見，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們重視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會議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批評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說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輕視过去，迷信将来”。这“輕視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謂“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應該以这为方針，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針。

事实上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一切都当从发展上来看問題。历史是发展，不是倒退。尽管旧时代的发展是不自觉的，統治階級甚至还有意以“厚古薄今”来箝制思想，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仍然今进于古。無論怎么說，鉄器时代进于銅器时代，銅器时代进于石器时代，或者是近代进于封建时代，封建时代进于奴隶制时代。今天是自觉发展的时代了，我們正應該标榜“厚今薄古”来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形成发展上的大跃进。

当然“厚今薄古”也并不是說只要今，不要古，或者是把所有古代的遗产都拋棄，并不是那样。这两者是对待着說的，对于今是要得多些，对于古是要得少些。国家不能把重点摆在研究古代或古物方面。古代史和古文物也須得研究，但只能占比較小的比重。例如中国科学院有六十几个研究机构，有六十多个是屬於今的，只有几个是屬於古的。而且我們的重点所是原子能研究所、經濟研究所等，而决不是古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这就是实际上的“厚今薄古”。象古时候的“学古入官”，“好古敏求”，搞學問就是搞历史的那样的时代，是老早过去了。

搞古代历史的人是要有一些，搞考古工作的人也要有一些。但搞这些工作的同志更要有“厚今薄古”的精神。我們为什么要搞古代史或研究古文物？目的是在闡明历史发展規律，讓人們掌握这个規律，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現在或将来的建設服务。我們并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更不是为崇古而考古。有“厚今薄古”的精神而从事考古，也就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从事古代研究，这样就如居高临下，使研究的对象能听自己的駕馭，历史发展的途径尽管有怎样的曲折迂迴。都无所逃形而历历实現在眼底。假使沒有“厚今薄古”的精神，那就只能是古人的俘虏，古文物的俘虏，一羣老古董和書呆子，既无补于实用，也說不上什么學問。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旧学界是沉浸在崇古的空气中的，言必称唐虞三代、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請問究竟出了多少了不起的人才？“厚古薄今”的方向是應該老早轉換了。

記得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在那会上我講过一次話。我說，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在党的领导下已經开辟了一个新紀元。我举出了六点来証明：（一）从旧时的唯心史观逐步轉向为唯物史观，（二）从个人单干逐步轉向为集体研究，（三）从名山事业逐步轉向为“为人民服务”，（四）从貴古賤今逐步轉向为注重近代，（五）从大民族主义逐步轉向到注重少数民族，（六）从欧美中心主义逐步轉向为注重亚洲历史。我当时为了鼓励大家，所說的多少是出于自己的期待。（詳細記錄見1951年9月29日“进步日报”[当时“大公报”的改名]附刊“史学周刊”第38期）。照今天的情况看来，史学界的轉向速度并不那么快。“厚今薄古”的口号提出后，全国学术界都在辯論，这一方面是好現象，但在另一方面也就表明学者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并未十分深入而一致，我們在思想革命上还需

要作很大的努力。

当然，崇拜古代也有它的历史根源。不仅我們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我們以前是言必称唐虞三代，外国是言必称希腊羅馬。这里有它根深蒂固的依据。例如古典艺术品是有它的不朽性，为后人所不能摹仿的；古代思想家和文艺家的作品也有它的不朽性和独创性，这就是“厚古薄今”的思想根源。对这种情况，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已經解释过，他是就希腊艺术与莎士比亚的詩剧来說的。特别是对于希腊艺术的不朽性和不可企及处，他說得很透辟。他說那是和古代未发展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古典社会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古典艺术作品便成为不朽的典型和不可企及的范本。“一个大人不能再成为一个小孩子，要不他就是呆子”。但他須得从更高的阶段上来發揮孩童的天真的本質，也就是創造性和积极性。这是說得再醒豁也沒有的。

就中国古代艺术来說，殷周的青銅器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的，不仅今天搞假古董的人摹仿不到，两千多年来沒有一个时代的銅器能够和殷周相比。其原因正如馬克思所說：产生那种艺术品的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古器物之所以古奥也还有年代的經歷包含在里面。尽管你在形式上摹仿到，甚至把古物作为模子从新翻沙，也翻不出那种的古香古色。那就是因为沒有經過那几千年的岁月，沒有受到原艺术作品在外部和内部所起的变化。所以古艺术品的确是不朽的和不可企及的。但是，能不能根据这一点，便可以認為古代的一切东西都比后来的好呢？当然不能！那样就真正成为“呆子”的思想了。那种想法是“以偏概全”，“厚古薄今”的人正是使用的这种方法，正是希望大人再成为孩子的一大羣“呆子”！

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别是百家爭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思

想，也有它的不朽性和不可企及处。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时代，学术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式的解放运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更加以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长期停滞，历来的思想和文艺脱不掉百家特别是儒家的窠臼，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就愈见显得是黄金时代。但在今天不同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两个阶段的跃进，思想和文艺，虽不那么显著，也有飞跃式的发展。象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

今天我们的知识比古人丰富得多，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和孟夫子。例如，今天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有第三个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古时的圣贤就根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当然，我们也并不想“以偏概全”，把古代的好处一概加以抹煞。再说一遍，古代史和古代文物，是须得加以研究，研究它的人不能太多，但也必须专深，才能发挥史学和考古学的作用。要阐明历史发展的正确轨迹，要强调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创造热情，他们尽管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依然留下了不可企及的典型作品，这样就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掌握规律，提高热情，勇于创造，勇于改革当今和今后的客观世界，来提高人民生活 and 物质生活的水平。以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古代，在今天和今后依然是必要的。要有人担任这项任务，而担任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厚今薄古”的思想方法，以保证自己和受自己影响者的红透与专深。红不透是专不深的。既要红、又要专，红要透、专要深，每一种业务都必须如此。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尤其必须如此。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是容易陷没的，搞得不好，每每爬不起来，所以必须更加坚决地抱定“厚今薄古”的精神以防自己陷溺并陷溺别人。象

在海水深处游泳的一样，尤其必須精于游泳术。

搞历史是要掌握資料的，但这不是目的。我們不能成为資料的俘虏，要掌握它，据有它，成为資料的主人或支配者。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資料，我們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責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們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及的高峯。在实际上我們需要超过他。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鉄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长的时期內，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話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說。“当仁不讓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規律。

搞历史的人，尤其搞外国史或世界史的人，精通些外文，我看是必要的。当然，这也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同样不能成为俘虏，而要成为支配者。精通些外文有好处，可以接触外国資料，更可以和外国学者交流經驗或作思想斗争。中国的著作譯成外文的，我觉得太少了。連毛主席的著作，譯成外文的都并不很多。我們在这一方面实在應該补补课。单懂外文不行，还得懂专业，因此搞历史的人搞些外文，我看倒不是多余的事。不过不應該強調“外文第一”，那是毫无問題的。事实上外文不是第一而是第二或第三，第一是思想、方法、立場——即是說“政治是統帥”。搞专业有了統帥，而再精通些外文，那就有利而无弊了。

学历史有它的重要性。历史是辯証唯物論与历史唯物論的具体的教材。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是有它的不可輕視的功用。由于肤浅地了解了“厚今薄古”的含义，有些人发生了輕視資料、輕視旧書本的念头，甚至搞历史的人也感到苦悶，这也是一种偏向。总之，“厚今薄古”必

須同时并提,今古是相对的,厚薄也是相对的,“厚今薄古”同时并提便成为合理的辯証的統一。如果搞历史的人听到“厚今薄古”而感到苦悶,那正証明他一向是“厚古薄今”。这样的观念必須立即改正过来,抱定“厚今薄古”的方针来搞历史,那就会心情舒暢,而且会在史学研究上出現大跃进。

(原載195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

*

*

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

范文瀾

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也必須大跃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历史科学工作者誰都想跃进,誰都想大大的跃进,干劲是足够的,問題在于如何跃进。陈伯达同志給我們講話,要我們“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如何跃进的問題解决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和如何实行这个指示。当然,对伯达同志的講話有不同意見的,还可以提出来討論,这里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講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現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現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講,越是古的越講,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現象,是一种衰暮的現象。伯达同志給我們着重指出来,要我們赶快糾正,是完全必要的。

持厚古薄今論的人也有他們的想法,以为学术是独立的东西,牵涉到政治就失去独立性,就不成其为学术。講古,不牵涉政治,所以是学术。講今,总要牵涉到政治,所以不是学术。这种想法有道理么?我想举出极簡單的事例和厚古薄今

論者商量商量。

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

因为你們厚古，我不免从古說起：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作春秋，从魯隱公元年写到哀公十四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春秋記載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按照公羊家的說法，春秋分三世：所見世相当于孔子和他父亲的年代，可以說是当时的現代史。所聞世相当于孔子祖父的年代，所傳聞世相当于孔子曾祖高祖父的年代，可以說是当时的近代史。再往上就不写了。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象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談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誅伐？第二，史記。司馬迁作史記，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說他薄今么？史記的今上本紀固然早已失传，但在平准書、封禪書中对汉武帝提出批評，这是不是談政治呢？第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这部書虽然比春秋、史記差一点，沒有写宋朝的历史，但也写到五代。看書名就知道他写書的目的是为朝廷講封建政治学，書中的“臣光曰”，那一条不是談政治的？这三部最著名的史書以外，不論正史或野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在叙述中就含有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說，贊、評、論、史臣曰等等的专为褒貶而作。野史的写成，多在两朝交替特别是在外族侵入統治中国的时候，当然有強烈的政治性。清朝因禁止野史，大兴文字獄。如果历史著作与政治无关，清朝統治者何苦杀許多人呢。由于文字獄十分殘酷，清朝学者才被迫放棄写历史，把精力轉到脱离政治的經学——考据学上去，这完全是在野蛮压力下

发生的变态病态，与顧亭林倡导学以致用的經学——考据学不是一回事了。到了清季中国产生資产階級，它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学术和政治又結合起来。举例来看，康有为作新学伪經考、孔子改制考，以变法維新为宗旨。这些講經学、史学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資产階級改良派的政治著作。江浙学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創办的国粹学报，以排滿复汉为宗旨。在学报里，講史学主要是宣传排滿，講經学主要是提倡复汉，这些談經学史学的学术刊物，同时也是資产階級革命派的政治刊物。由此可見，中国資产階級的早期代表人物并无学术應該和政治脫离的說法。

史書有多种体裁，自然有各种不同的写法。这些表現出明显的政治性，有些表現得不那么明显或完全与政治无关，不論表現的形式如何，归根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終究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書，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厚古薄今是資产階級的学风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学获得了馬克思主义的指导，开始表現划时代的大发展，成为服务于人民革命的一个力量。反动統治階級的学者們，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脫离，企图使学术脫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沒有灵魂的死东西。事实上，他們自也是想把反动的政治和学术結合起来的。蔣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結合了，可是对他們說来，結果坏得很，卖国賊的口供，不打自招了。記得有一个人在他的一本書里替秦檜說好話，鬧得報紙上“輿論嘩然”，这不是想替蔣介石辯护反而明明白白告訴人們說蔣介石就是秦檜

么？在这一点上，胡适比那些笨伯們狡猾得太多。他是反动政客兼反动学者，学术和政治在他身上紧紧結合在一起，但在表現形式上却一般是采取政治和学术分开的手法，写出許多瑣瑣碎碎一字一句所謂点滴功夫的考据文。其中考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的考据文，就当作研究历史，認為考据等于历史，他們既然把历史說成“垃圾堆”，那末，撿些片言只字考一考，也就可以自称为做史学工作了。胡适这样做，教他的追随者也这样做。这样做的好处何在呢？掉进煩瑣主义泥坑里的人，（一）不关心革命的政治，因而可能傾向于反动的政治；（二）不关心反动的政治，因而有利于蔣介石的橫行无阻。無論是（一）或（二）都对蔣介石有好处，所以，脱离政治的学术正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学术，多么巧妙呵！

胡适，經過我們近几年来大規模的批判，一般地說，我們史学界已經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覺的胡适門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絕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絕学习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須对他开战。还有一种人是不自覺的受影响者。他們在蔣介石統治时期，不了解馬克思主义，也不滿意蔣介石的反动政治，覺得胡适那套說法可以安身立命，因此，学习做一些瑣瑣碎碎点點滴滴的考据文章。挑选題目，总要离开现实愈远愈好，寂寞的三代于是变成了熱鬧的市場。因为厚古薄今的习惯已經养成，要改到厚今薄古的方面来，不免感到困难。但是，他們是愿意学习馬克思主义的，而且已經取得或多或少的成績。这种人为数較多，經過自我改造的努力，把旧影响抛掉，是我們史学界的重要力量。

自覺的胡适門徒和不自覺的受影响者两种人情况不同，但他們厚古薄今，逃避现实、脱离政治的学风是一样的。这确

实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陈伯达同志对这种“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的学风”，予以严正的指责，我们应该深刻反省，从“象牙之塔”跳出来。

上面所说的话，总起来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大建设的今天，还保持学术脱离政治的想法是错误的。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不扫清从这个错误想法产生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学风，历史学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跃进的可能。

下面，我谈谈对伯达同志讲话的一些体会。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必须认清这一点，担当起兴无灭资的责任。不管我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现在少不要紧，只要学就会多起来，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明确地站在马克思主义阵线这一边，确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要这种气势壮，力量也就来了。那些自称为有学术的资产阶级学者，如果敢于在人民面前翘尾巴，拒绝改造，我们应该毫不留情的藐视他们，要知道，凡是装腔作势的人，一定是庸妄浅薄的人，他所自恃的一点所谓学术，既然装在小器里，其不多不大，可以想见。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较短的期间内，消除资产阶级学术在史学上的影响，是完全有把握的。

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认真地下功夫，用成绩来证明厚今的意义远胜于厚古。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